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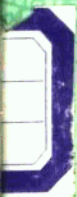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

汪生随笔

金武祥 著 林其宝 编选、校点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王 杰
版式设计：任志珍
责任校对：林其宝
封面设计：孙超英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

书 目

甘穉随笔

指严随笔

庸庵随笔

澹生随笔

南亭随笔

仲可随笔

穉卿随笔

霞外随笔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前言

尽管“随笔”一词，迟至南宋·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方才出现，并用为书名，但这种体裁却古已有之，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许多篇章，其实就是后世所谓之“随笔”。非只此也，就连号为经典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，又何尝不是后世所谓的“随笔”？

为什么随笔一体如此源远流长，虽历数千年，迄为著述家与读者所钟爱？

说来，其因不外：

一是随笔之“散”。所谓“散”，系相对于历史上曾代兴之“韵文”（如楚辞、汉赋之类）、“骈文”（即所谓“四六文”）等而言。因其属于“散文”，故无固定之程式和法则，执笔者可享充分之自由，无所拘束，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，且其形式一般不为时代风尚所左右。

二是随笔之“随”。即主题不限，内容不拘，可庄、可谐、可大、可小，随所感、所闻、所见，皆得直抒胸臆，信笔书之，若话家常。不必有系统，更无须顾及全书之结构，即使是“东一榔头，西一棒锤”，亦不致见

讥于人，谓非著述之体。

三是随笔之“短”。凡号为随笔者，篇幅皆有限，一般均以简明扼要取胜，即便阅读，又利于内容之浓缩。以同等篇幅论，则“随笔”读来省时，且所包含之信息量相对为大，为丰，使读者得事半功倍之效，获开卷有益之实惠。

四是随笔之“松”。随笔所含，较少庄严凝重之内容，其题材多相对轻松活泼，或属人生之体味，或属故典之探究，或属社会之新闻，或属闻人之逸事，或属谈诗论文，或属研艺述珍……总之，一般多具趣味，分别以哲理性、知识性，予读者以多层面之启发，既有裨见闻，亦足资谈助。无艰于阅读之劳苦，有品味高尚之收获。犹之轻音乐之可令人愉悦、放松，享消闲遣兴之乐。

这散、随、短、松四字，既为随笔之长，相对亦为其短。散，或致缺乏义蕴、文采；随，或流为冗琐丛脞；短，或易偏而难全；松，或失诸肤浅庸俗。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。惟在执笔者之善于驾驭。名家与恶道、杰出与庸俗，亦由而别之。实例具在，不必深论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：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，和世代著述家的努力，“随笔”这块园地已是流派纷呈，争奇斗妍。

有的侧重于议论感悟，有的侧重于掌故珍闻，有的侧重于谈文论艺，有的侧重于搜奇列异，有的侧重于抒发感情，有的侧重于研究学术，有的侧重于描绘故事，有的兼而有之……此系就内容而言。至于在写法上，或

致力于艺术渲染，或致力于本色写实，或致力于单线白描，或致力于浓墨重采，或综而合之……亦各有独到。

这种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形成，既基于著者之学养与情趣，更决于著者的造诣与功力。“孙猴、八戒，各有所爱”，读者尽可自择所尚，初不必有所轩轻。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解释一下“笔记”与“随笔”。脱开现代文艺学的范畴，就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，人们习称之“笔记”，当然属于“随笔”，但却不能等同于“随笔”。

盖“随笔”，即洪迈所谓“意之所之，随即记录，因其后先，无复论次”者也，故其范围更宽，更广，除习称之“笔记”外，诸凡非专著性，而系零篇短什之野史、稗乘、书事、纪闻、传人、述感、序跋、题识、游记、日记、语录、书札等等，皆可归之于“随笔”。

本丛书之取名“随笔”，意在示其包罗对象不仅仅限于习称之“笔记”。

同理，本丛书所谓之“近世”，亦不尽同于习用作历史分期之“近代”。

今中国历史，以鸦片战争至“五四运动”为“近代”，“五四运动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“现代”；世界历史之分期，则非但说法各异，且无一与中国历史分期吻合者。本丛书仅取其相通者为参照，而用“近世”一词之古义，即《荀子·非相》篇所谓“远举则病缪，近世则病佣”的“近世”，意谓去今不远之时世。

具体说，系指自清中叶即鸦片战争前数十年（十九世纪初），以迄 1949 年。如此划分的目的有二：一是想把鸦片战争前的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背景包括进来；二是由于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，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。

持此为范围，凡生活于其间之文史随笔作家，纪述其间事实之文史随笔作品，皆在搜罗与发掘之列。当然，其中之记述内容多有上及清初，甚或更早者，但须以记上述“近世”者为主；其中作家之生活年代，或有其生早于十九世纪初，或有其卒已为建国之后者，但其主要文史随笔著作的产生及其成名，则应系上述“近世”之事。

至于本丛书之于“随笔”前特冠“文史”二字，是想稍稍限定范围，即将专门属于美文、专门抒发情感、专门探讨哲理、专门从事议论、专门搜奇列异、专门研治“经学”的一些“随笔”除外，力避虚空、繁琐和过于艰深。

所收罗者，侧重习指之“文史”，即文化与历史，以掌故性、知识性和启发性，使读者于可读耐赏、广知博闻、明目醒脾之余，对近世文史随笔作家及其著作有所认识与了解，聊充深入探究之津逮。

丛书名称中之“选粹”二字，既体现了编辑的宗旨，也标明了编辑的方法。

“选粹”者，择其精华也，撷其纲要也，提供读者

以经过挑剔、加工之精神食粮也。近世文史随笔著作虽然相当丰富，但内容亦颇驳杂、参差。本丛书既定位于一般文史爱好者和有兴趣于广知博闻，汲取有益之精神营养的读者，而非专门研究者，自然不必无别优劣，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全文照印，徒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和本可他用的纸墨。因而，“选粹”便成为必要。

且惟有“选粹”，方符“批判地继承”旧时精神产品的正确方针；惟有“选粹”才能更好地实现“便于读者认识近世历史文化社会，了解民族优秀文化遗产，鉴往励今，推进两个文明建设”的编辑宗旨。

选粹，包含了两层含义：一是在众多作家中“选粹”，一是在该家众多作品中“选粹”。也就是把优秀作家和他的优秀作品发掘出来，经过加工，贡献于读者。虽系尝鼎一脔，但足可由而略窥全盘。

其间，在每辑所收八家中，适当注意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、不同时期作家的搭配，以免单调。由于限定每位作家一册，故其随笔著作之总篇幅未超过二十万字，致无“选粹”余地者，则只好割爱。

具体操作中，则根据诸家作品的实际，以“四性”、“六不取”为原则。

四性，谓知识性、趣味性、科学性、史料性。

六不取为：过于深奥，为今日一般读者所隔膜者，不取；攻击、污蔑、歪曲农民起义者，不取；丑化、歧视兄弟民族者，不取；宣扬宗教、迷信者，不取；低级

趣味或格调不高者，不取；与时代潮流、现行政令抵触（如宣扬早婚、纳妾、多子多福、嘲诋火葬之类）者，不取。

需加说明的是“六不取”所指为内容主旨，非指个别词句。若称农民起义为“匪”、“逆”之类，不必因有此类词句而概弃之，相信读者自会鉴别。余可类推。

至于因时代与阶级地位限制，在观察的准确，立论的允当，记述的严谨方面，原文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，自然未可苛求，于此不必细说。

由于近世文史随笔著作，多采用比较浅显的近世文言文，用繁体字，或无标点，或仅有断句，且在称谓习惯、书写格式等方面，亦与今不尽相同，不便今日一般读者阅读，加之所据底本，难免抄印之讹误，所以必作相应之加工。但这加工，非谓修改或删节原文，而系在保存原文的基础上进行。

具体包括十二项：

一、校订文字，对原本抄写、刊印之讹误，在理由充分、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采取径改法，不另说明；对属于疑似之间，无确切把握者，则姑仍其旧，不擅为更动。原文中以□□□隐去其名者，一律仍旧。个别无从辨识之字，亦以墨框示之。

二、改为简化字，统一异体字，加现行标点符号，横排。

三、凡于兄弟民族名称加“犬”旁之类，意存污辱

者，统回改为该兄弟民族之本称。

四、除原无条目标题者，概为新拟条目外，原有者亦视情况，或保留，或重拟，并于导言中说明。

五、对行文中使用字、号、别署，以及以谥为称、以籍为称、以爵为称、以官为称者，统于新拟标题中列出该人之姓名。

六、对因未取其前之具名条，而所选条又中脱姓、脱名、脱年号、脱地名者，一律补于文中之相关部位，并附〔 〕以别之。

七、原文中之小字夹注，则改为同号楷体字，加（ ）以别之。个别或仅以不同字体区别之。

八、原文过长者，酌为分段。或撷取其中有关部分，单独立条。惟均保持原文完整，中不删节。

九、每册依内容性质，或依来源，分为若干类，并拟类目；类下之条文，依符合逻辑之原则排列，不尽依原书。

十、每条末，注明来源、出处，以便复按。个别或取统一说明法，不一一具列。

十一、书首统加以《×××（该书著者）和他的随笔》为题之导读专文，介绍著者及其随笔，说明选编中之有关事项。

十二、书末统附有关该著者的碑传资料，及其随笔著作的叙录资料。

如此加工的目的只有一个：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

解，尽量减少阅读与了解的“拦路虎”。

因系经过抉择、加工之新编，故统以该作家之字、号，后赘“随笔”二字为各该册之书名。计划以每辑八册，分辑陆续编印。

尽管旨在为读者献上一套经过选择与加工的雅俗共赏、品位高尚的文史读物，立意正大，将事认真，但是否符合读者口味，特别是上述选粹原则与加工方法之是否有当，均有待于读者来审查与鉴定。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不惮风险，勇于组织编印这套效益尚未敢必的丛书，尤足征其识见与魄力。作为选编者的我们，更殷切期望得到方家与读者的批评、指正。

1997年溽暑，姜纬堂谨识于京华两知二有之斋，时年花甲有二。

金武祥和他的随笔

姜纬堂

在本辑丛书推出的八位文史随笔作家中，本书著者，以诗人、著述家、刻书家鸣世之金武祥，是惟一一位得享高龄的寿星。他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，卒于民国十三年（1924年），终年八十四岁。非仅长寿，而且年过八十，犹不辍吟咏，未离铅槧。谢世前一年，犹刊行新著诗集《陶庐七忆》。此在旧时，洵属难得。

武祥，原名则仁，字淮生，号粟香，又号菽乡，别署一丘山人、水月主人等，江苏省江阴县（今改为市）大岸村人。江阴，向属常州府（今常州市），故或谓其为常州人，虽未始无因，但终非确实。

常州，乃至江阴，素为人文之乡。江阴金氏，原居常州府武进县（常州府治，即今常州市），明代移居江阴县马口村，清初又分支于大岸村。在清代，江阴金氏，号为县之著族，科第蝉联，代有闻人，堪谓文化世家。惟传至武祥一房，则颇不逮先世。其祖，未入仕；其父，亦仅依人作幕。二人虽皆有《集》，后由武祥付

刊，实皆未足名家，仅可证明其赧继诗书家风而已。

武祥自幼随母就师于外祖武进罗墅湾谢氏家。谢氏亦文化名门。承父、母两系之书香家风，武祥自幼即锐志向学，打下较好的根柢，早岁便以诗、文脱颖于乡里。然而，在科举道路上却颇不顺利，成秀才后，数应乡试，皆不第，迄未考中举人。在仕进途中，屡屡受阻。

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太平军占领常州、江阴。年方二十的武祥避走浙江，阻于嘉兴，不得已而间道归里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始又离乡，远赴江西就婚。时，其岳父任江西会昌知县。武祥即入赘于县署。其室，即古以诗词鸣之黄馥。虽属寄迹依人，但颇得闺房唱酬之乐。

自此以至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，武祥先是从其岳于历任州、县，继则应邀充其他州、县官之幕友。是即其所谓之“薄游江右十载”。其间，既于官场情形多有阅历，更为其所至吟咏增添了丰富诗料。后结束为幕生涯，回到故乡小住。为求未来发展，而循当时之“捐例”，纳资取得入仕资格，分发广东。
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武祥以“捐班”至粤候补。由于其甚讳因捐入仕之出身，故今尚无以明其所捐得之官阶。据其在粤仕履，颇疑所捐为正五品之同知。清代制度：捐班候补，需经考察试用期，始得如“正途”出身者受差遣。所谓“差遣”，无论在本省或出省，皆属临时事务，例称“××委员”，亦或奉命入督、抚、藩、

臬署办事，例同幕宾，自属优厚之待遇。倘无差委，则无薪水，却例需至抚署参谒、候差。差遣达规定年限，表现优异，始得由督、抚题请“署事”。再经一定年限，表现优异，方得补授对品或低职实官。

考武祥著作，知其先后所奉临时差委颇不少，足见其吏才之见赏于上司。其中，光绪五年之转饷入都，乃当时之优差；八年之查勘广西边防、查勘广东西宁、广西岑溪两邑争界，则系奉两广总督差委，非能员不足当其任；十一年至十四年之“监鹺梧州”，更属难得之久差。张之洞督两广时，且一度命其入署办事，则尤见优遇。
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，又得署赤溪直隶厅（民国间并入台山县，今改为市）同知。赤溪地处滨海荒瘠，时辟厅方二十三年，尚属草创，自然不是美差。但在宦途拥挤，官多缺少之当时，以一“捐班”而得膺其选，亦属不易。虽系委署，并非正任，但实握篆，为一地之首长，也总算是实权的百姓父母。惜次年即因“丁忧”而依例解任，回乡“守制”，未得尽展其抚民之才。

武祥在赤溪有诗云：“青幡彩仗趁芳辰，远宦频惊物候新；星纪已周行万里，一官吟遍岭南春。”颇以宦粤十数载，“岭东、岭西，游迹殆遍”，诗囊为满而自喜。其间，不仅所至登览山川，考求古迹，兴复名胜，提倡风雅，而且注意吏治民瘼，兴利剔弊，多有善政、嘉谋。同时，更写下多种著述，校刊大批书籍，其以诗

人而为著述家、刻书家之地位，亦奠定于斯际。因而，这一阶段实其一生中最富光采之时期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“服满”，武祥再赴粤东。虽牵延两载，迄未补官，今亦无其曾获临时差遗之线索可考，看来是颇不如意。遂于二十二年告老，辞官归里。其甥邹嘉来说是：“见时局日非，遂归不复出。”这所谓“时局”，当然也包含着当时广东官场人员拥挤，补官无望的形势。不论怎么说，武祥确是自此告别官场，时年五十六岁。

由于武祥之成文碑传资料极罕见，故一般言及其生平，多语焉不详，且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讹误。近编《江阴市志》之《传》，亦然。最突出者，即其出身及仕履。据民国《江阴县志》，则世谓其“光绪八年，应乡试，中举人”，以至国谓其官至盐运同（从四品）、盐运使（正三品）、曾任督粮道（正四品）等等，皆属不明时制之误说。其最高官职，仅是“署赤溪直隶厅同知”，即其自谓之“权赤溪”、“摄赤溪”。所冠“署”字，颇有关系，表明其宦粤十数载，尚未补授正五品，遑论更高者？故言其终官而遗漏“署”字，亦非。

还乡不久，武祥即由江阴乡间迁居常州城内。除出游、访友、课孙外，则以著述、刻书为事。因众望所归，一再被推戴参与常州府之文教、公益、慈善事务。清末，曾被当局聘充江苏通志局采访、常州府志局总理；入民国，又出任江阴县志局首席分纂。对故乡文化

之整理总结，地方史志建设，多有贡献。

其已刊之著作，有诗：《漓江游草》一卷。又有《陶庐杂忆》、《陶庐杂忆续咏》、《陶庐杂忆补咏》、《陶庐后忆》、《陶庐五忆》、《陶庐六忆》、《陶庐七忆》各一卷，凡七言绝句七百五十首，各注事实于诗后，实即生平经历、见闻之诗咏，尤侧重于风土、民俗、人物。文，则有《粟香室文稿》一卷、《漓江杂记》一卷、《赤溪杂志》二卷、《粟香随笔》八卷、《粟香二笔》八卷、《粟香三笔》八卷、《粟香四笔》八卷、《粟香五笔》八卷。

已刊辑作有：《江阴金氏文剩》一卷、《松筠阁贞孝录》一卷、《附录》一卷、《江阴艺文志》二卷、《校补》一卷、《表忠录》一卷、《附录》一卷、《思忠录》一卷、《冰泉唱和集》（自此以下为诗）一卷、《续和》一卷、《再续和》一卷、《附录》一卷、《闰集》一卷、《霞城唱和集》二卷及摘录友人致其函札之《兰言偶录》二卷。

校刊有《江阴丛书》、《粟香室丛书》，包括其所著、辑在内，凡六十余种。其中，多数为常州、江阴历代著述，少量为岭南人著述，个别有其非苏、粤籍友人之遗著。

此外，还曾助盛宣怀辑刊《常州先哲遗书》、助屠寄辑刊《常州骈体文》、助其表弟缪基孙辑刊《常州词录》。由缪氏总纂、金氏分纂之民国《江阴县志》亦已成书付刊。

从上举，足见其著述之勤与刻书之多。其中，无论著述与刻书，在粤所为者占一半以上。合其所至吟咏，提倡文教，致被目为“风雅吏”。友人舒佐尧尝戏谓：

风雅一道，为居今最无益事，诸有位者往往蔑视而厌弃之……彼……非尽不知风雅之可好也。徒以无与己事，不能弋高爵，博厚禄，且大有妨于倾身障簏之谋，故不欲以此易彼也。

至以武祥独“好之如此之殷，为之不遗余力若此”，为“甚矣，惑也！”虽系正话反说，但适足见金氏之独具追求，迥出恒流，功在文化，成绩斐然。

金氏一生所最为致力者，则在诗。其诗，颇为时评所重。陈晋熙谓为“清华名隽，独抒性情。至感念时事则悲歌讽谕，尤有老杜、白傅之风”。周星誉谓为“神味渊永，吐属风流，如公瑾醇醪，令人自醉”；“近体驾古体之上”，“近体中，则七言律、绝尤擅胜场”，“最工七绝”；“然非逾岭南游，那得如许奇构耶？”颇能道出金诗之特色。武祥自称：“余所作《芙蓉江上草堂诗稿》，分十二卷，凡千余首，未敢付梓。”致今仅得见其入粤前之四卷稿本，适与所著《粟香行年录》之因未刊而难觅，同其可惜。

感事怀人和模绘山川风物，是金诗的主要内容，以泛政治化的标准来看，固非上选。然而，诗乃审美之艺术，且向为百花竞妍之园地，实未可执一而论。持此以观，则金氏终为一代作手，其中不少精品，自有其不磨

之价值在。如其最为世所传诵之《遍游桂林山岩》：“未暇骖鸾信不诬，玉簪罗带路萦纡；桂林山水甲天下，绝妙漓江秋泛图。”至今犹为言桂林山水者奉为经典之句，称道不绝。即其一例。

金氏著作之流布最广、影响最著者，则为随笔。其中包括：有意效仿南宋·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至《五笔》之《栗香随笔》至《五笔》（分别付刊于光绪七年、九年、十三年、十七年、二十年，除原刊外，又有《江阴丛书》本、四川、云南翻刻本、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）；著于光绪十七年，并于当年付刻之《赤溪杂志》（除原刊本外，又有《江阴丛书》、《栗香室丛书》本，又有《小方壶斋舆地丛抄》第九帙本）；著于光绪八年之《漓江杂记》（初附刊于《栗香二笔》，继收入《小方壶斋舆地丛抄》第七帙，又有光绪二十三年单刻本及《江阴丛书》、《栗香室丛书》本）。

本书即由上述金氏随笔选编而成。《赤溪杂志》、《漓江杂记》据小方壶斋本，校以金氏刻本，《栗香随笔》至《五笔》则据金氏刻本。其中，除《栗香五笔》每则原具标题外，余皆无。其原无者，今统为拟加；原有者亦仅部分沿袭，而以新拟者为多。

所选，虽限于篇幅，数量仅其三之一，但足见金氏随笔的风格与特色。其中，有三点需稍加申说。

一是其内容。汪琬曾指出《栗香随笔》及其三续之“四善”：述德、敬乡、经务、闾幽。屠寄则概括为“五